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5.006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特征及经验

豆勇超^{1,2}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翰林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2.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大致经历确立时期、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时期、新时代创新发展时期四个阶段, 呈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三大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 意识形态建设要与中国经济基础发展相协调, 必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必须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建设,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意识形态建设; 建设型意识形态; 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原则; 马克思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5-0035-07

引用格式: 豆勇超.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特征及经验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5): 35-41.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OU Yongchao^{1,2}

(1. Hanlin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s ideology construction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new era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It present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and the unity of criticality and inclusiveness. It adheres to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of Marx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in harmo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foundation.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c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core values. It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word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ve ideology;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arxism; core values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与应对方法”(2017SJB2137);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数字化背景下手机App的运用对‘教为不教’中‘教’的影响研究”(YZ-c/2018/53)。

作者简介: 豆勇超(1982—),男,河南临颖人,南京中医药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话语权等方面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其研究更多地是从具体领域展开。本研究着重从宏观视角出发,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梳理,总结和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变迁的特征和经验,从而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参考。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引发了我国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焕发出强大活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决胜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特征和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执政地位得到确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日益凸显出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进入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总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下,从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首先,明确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197}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党内意识形态建设中,也在思想上层建筑中占支配地位。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领导,新文化同样离不开无产阶级的文化

思想的指导。^[2]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303}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大部分时候用“文化”“思想体系”“观念形态”等来代表“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延续了这一用法。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党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核心。其次,明确提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对党进行伟大斗争这一工程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开展得是否顺利,事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能否顺利完成。^[1]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高工作效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的作用”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名论断,从而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方法。他明确提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双百”和“两为”方针。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他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54}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最后,他明确指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力量在于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也需要无产阶级接班人。

总之,毛泽东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以及如何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党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左倾”错误的蔓延,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 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

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由原来的革命型转变为建设型。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的。首先,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局面。“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敏锐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澄清其混乱局面。他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重新评价毛泽东，完整地、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认为，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与其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指出“两个凡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精神。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而完成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破除“左”的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必须要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就成为当时的突破口。1978年5月，邓小平同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局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决定，从根本上杜绝了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由此，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

其次，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建设型意识形态转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是革命型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改革开放以后，新旧观念交织，旧的观念不会立刻消逝，新的观念也不会立刻得到人们的认同。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两股错误思潮：一股是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极左”思潮，一股是反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而反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极右”思潮。这两股思潮的出现实质上表明，在没有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形成前，党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地位在下降。在1979年3月底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它上升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要长期坚持下去。他指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思想上、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统一的认识，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中，曾一度出现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在

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4]这里所说的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压迫阶级腐朽思想的代名词。如果不在思想领域与这些思想展开斗争，那么它就会逐步侵蚀人们对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任。随后，党中央召开的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和根本任务，提出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总之，这一时期革命型意识形态转化为建设型意识形态。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基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载体，服务于经济建设。

（三）意识形态建设的坚持和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平演变”和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复杂环境中，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时期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在坚持以生产力（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文化建设以及综合国力组成部分方面的建设。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面对苏东巨变、市场经济等挑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逐渐认识到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地位。第一，凸显意识形态建设这一工作的战略地位。江泽民在深刻反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得失，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政治权力的斗争。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败。第二，明确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上。综合国力，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方面，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意识形态的建设，关乎文化建设，关乎综合国力的竞争。第三，

强化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社会思潮多元化局面,江泽民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强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5]坚持党对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一元主导性,不搞思想上的多元化。在强化党的领导权的同时,也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第四,明确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江泽民在强调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路径。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形成极大的挑战。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表现在综合国力中的文化建设方面,具体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斗争上,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首先,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就指出意识形态是党与敌对势力斗争的重要战场,我们要始终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7]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是综合国力之间的较量,其主要体现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就是核心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依据,决定着—个国家制度的变化,影响着社会的主导价值。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冲突的聚焦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

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8]。面对“普世价值”等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核心价值观如何在这场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十七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方面提出以一元(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凝练和培育适合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也就是说,党通过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以及加强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从而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四)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领导集体在进入新时代后,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形势,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根据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作了新的阐述,进一步推动了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首先,强调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性。习近平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思想宣传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习近平在2016年2月的《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道路、路线、事业、凝聚力和前途命运。^{[10]331-332}“五个事关”点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性,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存亡、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

其次,注重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整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新时代背景,习近平进一步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整体中,把意识形态创新与整体性结合起来。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习近平对宣传、新闻、网络安全、高校思想政治等工作做了创新性论述,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最后,规划了具体实现路径。一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掌握:(1)提出中国梦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创新表达。

中国梦，是习近平在新时代结合中国现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党的主张表达出来的概念，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话语表达。“中国梦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是当代中国凝聚党心民心、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和高昂旋律。”^[11]（2）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实践解决意识形态冲突的聚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教育、实践和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如何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42]二是抢占新闻舆论制高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要随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而变化。习近平一方面从治国理政角度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指出要在尊重新闻舆论工作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10]^[33]三是抢占网络平台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习近平强调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10]^[325]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在探索中得到总结，在总结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得到完善，其整体上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一）从变迁的进程看，体现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特征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在已有事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新的意识形态是在吸收旧的合理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的，继承和发展是相互统一、不能分割的。党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创新，正是在不断地吸收前人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的。邓小平领导了意识形态建设由革命型向建设型的转变；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载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等。这一切都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二）从变迁的内容看，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

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于其真理性，具有真理的意识形态才能拥有持久性；而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在于它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作为中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一种理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在注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注重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性，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1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中心。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推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凸显，胡锦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提出科学发展观，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性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有机统一起来。

（三）从变迁的内涵看，体现了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选择性的特征，单一性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得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在坚持原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掌握领导权、增强包容性，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前提下，提倡多种文化形式，坚持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的要求，在每一个社会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除了主导意识形态外，还有其它社会意识存在。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包容性这一原则。但是包容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地纵容其它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绝不是无原则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4]在抵制错误思

潮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又具有批判性的特征。所谓批判性,即排他性,批判异质性的意识形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教化功能,从而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即吸收整合有利的、排除否定不利的。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历史变迁和特征的梳理,可以把其经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

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虽未专门进行过系统研究,也没有具体阐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层次性等有着明确的论述,这些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指明了方向。苏联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不断争夺话语权,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重大冲击。苏东巨变,在意识形态领域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邓小平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长期坚持下去的方针;江泽民在邓小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提出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胡锦涛指出,必须巩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思潮;习近平则强调“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不断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不断变革意识形态的话语。

(二) 意识形态领域建设要与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相协调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是从物质生活实践开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对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我国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在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注重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互联网的普及、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原来的革命型意识形态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需要我党建构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重新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提出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于综合国力竞争的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建设。胡锦涛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如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中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上,提出把意识领域冲突聚焦在核心价值观上。习近平围绕着“坚持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通过整体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整体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在新时代得到有效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有关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论述,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不断发展,使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协调。

(三)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必须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建设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2][4]}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在一定程度可以和社会主义文化等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在注重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现在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之中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上。虽然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竞争仍然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但是重心则转移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上，而文化软实力则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竞争。

要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就必须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并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对其进行了界定。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先进文化为导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十七大突出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再次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文化社会思潮”。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证明，只有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才能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5.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 [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0.
- [6] 《人民日报》编辑部.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0-06-29(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1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61.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4-09-26(1).
-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42.
- [13] 李国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价值不容否定：割裂思想武器和科学信仰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与背叛[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6)：2.
- [14] 胡振平.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包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0)：20.

责任编辑：黄声波